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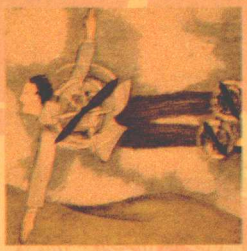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

文学即人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短篇报告文学

〈五〉

卷

1050233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中短篇报告文学

〈五〉

卷

冷梦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0233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挑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沥炼，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冷梦卷

黄河大移民 …… (1)

岳恒寿卷

簰洲湾的伤口 …… (81)

蒋巍卷

太阳,连结着又一颗太阳 …… (98)

朱竞若卷

心中只有国门 …… (118)

邓加荣卷

烹饪王国的吃喝疯 …… (163)

苦丁卷

'92 中国奥运重奖实录 …… (183)

冷 梦 卷

黄河大移民

——三门峡移民始末

引 子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六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二十八万多陕西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养聚息的热土，迁移异土他乡……

三十八年后，人口的自然繁衍，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增至四十五万多人，他们的一部分重返家园，但故园已非旧时貌；他们中的相当多人，仍在当初迁移的渭北高原沟壑区。

历史是相当沉重的。

它制造了一个延续了三十八年的悲剧，铸成了几十万苍生的不幸与苦难。

1994 年初刺骨隆冬，记者驱程几千里，接触了这个由一段光怪陆离的历史造就的特殊贫困群体：陕西移民部落。

第一章 光荣与逃亡

1. 记忆中总是有雨。远迁宁夏的先遣队员

“我们走的那天下着雨，奇怪得很，在我的记忆里，凡是和移民有关

的重要日子都下雨。华山脚下共青团誓师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宁夏移民先遣队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后，我们返迁回库区那天还下雨。

——记忆中总是有雨，下雨的日子里他们离开了家园。

1956年秋，首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遣队5208人出发了。情形有点像凯旋军远征，又有点像当年解放区人民欢送子弟兵，先遣队员们披红戴花，喧闹的人群敲锣打鼓，村道上，大路边，卡车排成一条长龙，在人们的挥手、热泪、祝福声和羡慕的眼光中，卡车鸣笛上路了。

村村落落，队队卡车，汇集成车的洪流，向西泻去……

先遣队员们有资格骄傲。他们是陕西朝邑、大荔、华阴、潼关几县几十万农民中的"好儿郎"，获得"先遣队员"称号是不容易的，"资格审查"相当严格。当时的红头文件规定：先遣队员必须以党团员、积极分子与贫下中农为主，适当吸收部分上中农；地主、富农、管制分子们不在入选之列。制定于1955年9月渭南地委宣传部《建设三门峡水库的宣传提纲》中写道：

> 三门峡水库是咱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对国家和人民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这叫咱们的人看起来，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咱们的好事情。反革命分子却是极端仇视的。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谣言，阴谋破坏治理黄河工作。

基于这种严酷的"阶级斗争"观点，先遣队员的审批必须经过三道程序：农业社讨论通过、乡政府审查、县政府批准。当一件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诸如"光荣"、"荣耀"的代名词时，人们的荣誉感便被大大激发起来了。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在移民中出现了父子兄弟相争、夫妻相劝踊跃报名的动人场面。仅大荔县杨村，分配名额154名，报名的就有1087名，其中兄弟相争约105起，妻劝夫者194件。南洛乡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在多次报名不予批准后，当众咬破手指，写血书以示心迹。朝邑县苍西村一个老太太为儿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先遣队员"激动得睡

不着觉，怕媳妇一个人赶制不出活计儿子去时耽搁了寒衣，一大早起来拐着小脚跑五里路把女儿叫回娘家帮忙缝衣，老婆婆说："政府叫我们到那里一定比我们这里好，因为自解放以来政府就没说过哄人的话。"

政府在百姓中拥有崇高威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弃离家园踏上漫漫西行路。

义和村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在华阴滩上有着一大片肥沃土地，这个村首批先遣队 87 人，全是三四十岁正当年的棒小伙儿。合作社副主任屈建忠，当年是这支先遣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先遣队员张西育，当年是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不足十八岁的小伙子。屈建忠去，因为他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负有一种神圣的责任；张西育去，因为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长这么大没有离开陕西，他想要远走高飞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无论出自何种动机，出发的那天他们相当激动和自豪。两位老汉谈起当年的情景：

"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一行十五辆卡车往宁夏去。五天路程。途中政府安排很好，让吃好、喝好、休息好、照顾好。沿途设有食宿站、水站等，饭尽饱吃，连吃带拿，上路前每人带两个馍，晚上睡大通铺。最后，我们来到了宁夏贺兰县平吉堡……"

一到平吉堡，他们傻眼了。

平吉堡靠贺兰山，沙漠边缘地带，半人高的茅草，无草的地方光秃秃一片；荒滩上满是拳头大的石头，仔细看去，老鹰印下的爪痕赫然在目！关中人吓得不由的倒抽一口冷气。义和村人在这片荒滩上搭了两个半草庵子，来年春天，在当地人们用拖拉机浅浅地翻了一遍的土地上播种下四十亩麦子。他们在此安家了。

……

亲人们翘首以待。不久，第一批信息反馈了回来。西平洛村一个青年写信说："父母亲大人心放宽，你儿住的荒沙滩；鞋底纳密底纳厚，你儿走的石子路。"大面积逃跑开始发生。据朝邑 1956 年 9 月"部分移民返朝情况"报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 800 人，三天跑了 361 人，其中途中拦挡回 260 人外，101 人"现无下落"；其余 439 人，"有的情

绪不安，时有回朝想法。”

逃跑的人分南北两路回来。

“北路军”长途步行，穿越内蒙沙漠，翻山越岭，路途艰险，粮断水绝，濒临绝境……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地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摸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吹嘘长叹，潸然泪下。

“逃亡者”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听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哭边听，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

风波波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一个老妈妈在地里拾棉桃，想起远在宁夏此时或许正在“受苦受难”的独生儿子，一屁股瘫坐在棉花地里，悲声大哭。

另一个老妈妈，疯了，傻了，不吃不喝，满村跑着找儿子，嘶哑着嗓门，叫魂似地一遍又一遍喊着：“儿呀，你回来！……”

一群老婆老头，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乡长骂社干部，手捣着鼻子溅着唾沫星子骂：

“你那时候说有多么好，现在都跑回来了，究竟你们是说话哩还是放屁呢？”

2. 大饥荒的阴影。杀子的父亲

再动员就困难多了。无论如何，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都更有说服力。

老移民王景亿回忆当年情景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五七年秋又让去宁夏，不情愿去，不行。干部说‘不去，井你跳去！黄河去跳去！没盖盖子！’派人绑绳把房拉倒，亲戚全家人哭得像泪人儿，就这样，我们一家十几口，母亲、哥哥一家，我带一儿一女（妻已去世），迁陶乐县……”

不情愿也得上路。当时的情景多少带有点强迫性质，有的躲到亲戚家里，被搜出来；有的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跑回来又被送走。上路时再不是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如同办丧事一般，老婆老头们坐上马车的一刹那哭天抹泪地嚎啕大哭，拍胸顿足骂移民干部：“哎哟哟，我的催命鬼哟！”

“移民们既舍不得离开祖先的地方，又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心疼地哭着走的！泊子乡张乡长亲自护送本乡移民到宁夏，乡长怕车颠了老婆老汉们，让他们坐卡车前边，自己挨车帮子坐。一到固原（今甘肃省境内）以北，荒秃秃的沙漠，老婆老汉们伤心地哭了，坐在车里面对面地骂乡长：‘张乡长张乡长日你妈，你把我送到你妈的×里去了！’乡长无奈，又陪笑脸又说好话：‘好伯伯，好妈妈，你甭骂我张永清，到你过上幸福的日子，你就想起我张永清’……”

大荔县移民干部仁茂全如今是位硕健的老人，1956 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和移民工作结缘，在张乡长挨骂的时候，负责护送移民的小伙子羞红了脸，心情极为复杂。

到陶乐县要过黄河，移民坐在黄河边就是不愿渡河而去，詈骂声不绝于耳，当然都是对着他们的“冤家”移民干部；移民干部要真正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厚着脸皮“迎战”移民的语弹骂雨：“你骂我受，反正我把你送到这儿了！”

……

1957 年秋，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老宋到宁夏去看望移民，走着走着，平平的地面突然塌陷一个深坑，宋主任猝不及防掉进坑里，沙土差点覆没了他。这就是宁夏移民安置区。严格地说，这是一批迁徙到边塞地区的垦荒者。那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移民形容当地气候是“一年一场风”，塞外荒漠，去年刮风不止，从春刮到夏，从秋刮到冬，风起之处，黄

沙漫卷，遮天蔽日，道路消失了，伸手不见五指，混沌天地一片。同风的肆虐和慷慨恰成反差，雨、雪、水格外吝啬，落雪了，下雨了，不足五分钟，连地皮还来不及浸湿，一场狂风刮来，雪住雨停。黄河大浪滔天，但在这里，奔腾咆哮的黄河纤弱得用抽水机抽不出水。大自然在这里制造了一个黄尘和流沙的世界，由于长年下不了一场透雨透雪，这儿尘土没及膝盖，大风卷着黄沙往一起旋，眨眼工夫堆积成无数沙丘，关中人做梦也梦不到这么大的风这么多的沙，晚上进了屋，第二天早晨，房门被流沙堵得死死的，犹如被活埋在沙丘里。

这儿的民俗也叫关中人吃惊。当地人的“天然粮仓”在泥屋顶上，看不见谷堆麦囤，也看不见牲口圈，空地上插几根木棍棍，牛呀马呀就“露宿”在外。陇牛居然适应这种简陋的饲养方式，既不跑丢，也不患个头疼脑热；秦牛却不然，尽管移民们心肝宝贝似地疼它爱它精心照料着这些伴随他们千里迢迢来此安家落户的家乡牛，可它们，还是一条接一条地永远闭紧了牛眼，再也听不见主人撕肝裂肺的哭喊和呜咽……

义和村带去的二十多条牛，没有多久，死光了。

秦地牛死亡的原因，主要是不服水土气候。

人也很难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更大的威胁和不幸，还不是来自大自然。

其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公社化”随之带来“食堂化”。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大饥荒。用“饿殍遍野”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过分。那是一场真正的“天灾人祸”。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死于那场大灾难。对于这些背井离乡远迁内蒙沙漠边缘地带的移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船漏偏遇顶头风……

饥饿降临了。这里的土地对陕西移民非常刻薄。当地人种的是水地、熟地，移民开垦的是荒地、旱地。干旱又像驱逐不走的妖孽，关中农民在失去了赖以生计的耕牛以后肩扛手犁抛洒下大把大把汗水好不容易播种下的麦子，两个月以后，它们竟冒不出那片喜人的新绿，扒开松松软软的干土，一看，麦种仍原模原样地躺在那里！农民颤抖着手捧起

麦种，仰望苍天，泪流满面，诅咒，诅咒这不赐给他们粮食的陌生土地！

87户义和村人再迁陶乐（由于外迁任务压缩，他们从黄河东岸的贺兰压缩合并到黄河西岸的陶乐），他们每人每月的口粮只有七斤半，佐以不多的土豆和红萝卜。今天的前义和村人却能“自豪”地告诉笔者：“在陕西移民中，我义和村人副食生活还是最高的。”为了活命，他们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煮煮充饥。他们也铤而走险，由“良民”变为“盗贼”，夜黑人静，扛上个破口袋，去偷当地人的玉米，这种“营生”当然风险，被当地人逮住打个半死不活。移民迁移之初，按政策规定只准带800斤行李，桌椅板凳箱箱柜柜早已处理，此时，他们能卖的只有随身带去的被褥衣服，用身上衣去换口中食，一斤红萝卜1.2元，一件衣服也就是一斤红萝卜。1958年刚刚复员就随家迁移到贺兰县一农庄的陈向荣，全家11口人最后卖得只剩下一床被、一身衣。倾家荡产了。活命却是那样艰难。

移民干部张维德，当年是个不足20岁的小伙子，他有一次亲身体验的经历。在移民点上，他迫不及待地端起了饭碗，他饿了，长途跋涉后小伙子早已饥肠辘辘，但农民捂住他的碗口，告诉他：“不是乡党舍不得让你吃，娃呀，听乡党一句话，你该吃两碗，只吃一碗；该吃一碗，只吃半碗。”张维德疑疑惑惑地看看碗中食。这是一种当地人叫“派子”的草籽搅伴着胡萝卜蒸成的饭，咽下之后，到下午就感觉肚子胀痛起来，异常难受。“乡党”流泪告诉他，有些人就是这样胀死的，贺兰一农庄八村有个老汉，吃了糠皮皮（即谷糠）蒸成的馍，肚胀拉不下来，儿子拉车把他送到35里外的银川医院，灌肠后，老汉嚷着想吃碗面条，儿子四处求告总算满足了老爷子微薄的一点心愿，可是，一碗面条吃下去，老汉却翻了白眼，撑死了！儿子拉尸又哭又笑：老爷子总算落了个饱死鬼！

饿得实在招架不住，有人想出了“辣子疗法”，一家之主的老汉们背着家人偷偷到合作社买点辣子酱，晚上冲上点喝下去，空空的胃囊里呛起阵阵辣潮，辣感觉麻醉了神经，在一种奇特的烧灼般的快感中迷迷糊糊进入梦乡。这些老汉因此而嗜辣成瘾，许多年后，没有那半碗辣子水就很难入眠。

活下来的老汉老婆是幸运的。复转军人陈向荣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移民村落的土墙根下一溜蜷缩着身子晒太阳的老婆老汉，“脸一浮肿，时间不长就毙了（死了）。”前几天还蹲在墙根底下的一个老汉，过几天不见了，不用问，就知道这老汉已命归黄泉；到来年春天，当荒漠上的太阳暖暖融融地普照在人们身上，蹲在墙根下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

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变得异常残酷。亲情也变得冷酷无情，骨肉亲人为你死我活自相残杀。贺兰县一农庄大队书记苗茂堂的亲弟弟苗茂盛饿死了，年仅30岁。副书记薛明寿的哥哥和弟媳妇（副书记的妻子）为抢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争来夺去，双方都死死抓着碗沿，稀饭在争夺中全部被泼洒在地上，大伯子哥和弟媳妇都傻眼了，遂放声大哭，不为姻亲关系的沦丧而哭，哭的是那碗没到口的稀饭！更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父亲叫薛辛友，儿子只有六七岁，那天在“食堂”，男孩缠着父亲要饭吃，父亲愁容满面地望着啼哭不已的儿子。他没有饭。他自己也快饿死了。儿子的哭声撕肝裂肺。小男孩理解不了父亲的尴尬，嘶哑着嗓子哭闹得愈发厉害，父亲发怒了，瞪着一双饿得昏花的眼睛，饿鹰般张着双臂扑到儿子面前，摇撼着儿子瘦小的肩膀，一声非人的嚎叫声冲出胸膛：“说！你要吃饭，我把你捏死！”——儿子还是要吃饭！哭声越来越弱，最后，儿子瘫软地躺在父亲脚下……做父亲的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身骨肉！望着从此不再会啼哭，也从此不再会喊饿，从此再也不会“要吃饭”的儿子，父亲笑了，瘆人地疯笑了。法律不宽恕任何有罪之人。当地公安机关逮捕了薛辛友，弑子的父亲以“谋杀罪”被戴上了手铐脚镣投入监狱。4天后，这个“杀人凶手”毙命于大牢。有罪的父亲紧随着无辜而屈死的儿子相会在另一世界……

30多年后，当年贺兰县一农庄党支部书记薛武亭讲起他亲眼目睹的这幕杀人惨剧，老汉哭了，哭得泣不成声，哽咽难语。他泪流满面地告诉记者：

“六〇年一年，我们大队饿死了17个人，17条人命啊！”

29岁的支部书记再也不忍看着父老乡亲们倒毙于饥饿。他心里

淤满了泪水，苦涩的泪河浸得他的良心抖颤，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他负疚多年的决定——此是后话。

3. 神秘的集体大逃亡。副省长的盛怒与内疚

1959年冬，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信中向父亲哀告：

“赶快想办法把我和奶奶搬回来，再不回来，就饿死了！我们已经把枕头里的荞麦皮都吃光了……”

这是迁移到陶乐县的王景仁的儿子写给父亲的一封信。王景仁只身逃回了陕西，寄身在亲戚家里。儿子和母亲生命危在旦夕。接信后，他心急如焚。可是，他连路资都没有，怎么“解救”这在千里之外的老母幼子？王景仁只有变卖唯一一件“贵重”的东西，他从宁夏穿回来的皮大衣。在华阴县城街上，王景仁被臂戴红袖章的税务人员抓住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集市上不得自由买卖。税务局要求他开一个证明，以证明他合法公民的身份及皮大衣的来路，否则皮大衣没收。王景仁既已落籍宁夏，在陕西就算是“黑人黑户”。无奈，他找了一个老熟人，证明算是开出了，但归还皮大衣有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返回宁夏（当时陕西政府各部门都在全力配合阻止移民返籍）。税务人员“押解”着他，用卖掉皮大衣的钱给他买了张火车票。王景仁返宁后，在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夜晚，偷偷将老母幼子接回了陕西。但此后磨难更多……

逃跑、返籍终于酿成一股潮流。逃跑次数最多的，达七八次之多；跑回来，逮住以后遣返回宁，如此周而复始，但只要有一口气，移民还是往回跑。其原因已经不说自明，一是饥饿，二是气候恶劣，三是媳妇不生孩子（移民说“让我们断子绝孙”）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移民和当地人的矛盾日趋激化。

当年，陶乐县全县人口6000多人，移民13000多人，是当地居民的两倍之多，按移民的说法。“我们移民东西扯了100多里。”人多势却不众。为种地，为活命，为民族风俗，移民同当地人的纠纷时有发生。水从高处流，先来者自然占据了有利地势，在河水贵似油、水成为活命之

水养家锅口之水的情形下，上游人截水浇地，则在下游的移民的土地很难淌进一两股清泉，眼看着庄稼焦渴得干死，关中农民豁出命来和当地人干架，这种聚众斗殴并不能改变水的流向，反而恶化了本当亲密相处的宁陕农民兄弟的感情。紧接着，从河水之争发展到井水之争。陶乐人卸了井绳，移民一怒之下拉了口猪搁到井台上宰杀，这种行为当然大大伤害了回族农民的民族感情和尊严，双方发生了一场铁锹镢头为武器的恶性械斗，一个移民的耳朵被铲掉，又从脖子擦过去，差点儿出了人命案子。时值会农县县长到移民点去慰问，余怒未消的移民将家乡的父母官打得重伤住院。穷困潦倒、饥饿、民族纠纷……使这群老实本分的关中农民变成了“暴民”和“野蛮人”。

当贫穷赤裸裸地展现在别人面前时，尊严和人格也就不复存在。老移民们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受人白眼惹人奚落的辛酸往事。在集镇上他们手里攥着可怜的钱买萝卜，卖主一听对方是陕西口音，忙一脚踩住布袋口，小贩们害怕这些饿疯了的老陕来偷来抢，瞪着警惕的眼睛密切注视严加防范。移民路过豆腐摊，眼看着白花花的豆腐垂涎欲滴，小贩白他们一眼，嘴角掠上一丝讥诮和不屑：“你们移民还想吃豆腐？”他们伤心了，感觉自己的人格受了屈辱。

这个时候，他们特别怀念自己的“家”。那片在黄、渭、洛三角洲的肥沃的土地和“心疼地哭上走的”弃离了的关中平原。那些祖宅。那片沃土。……

有人开始不顾性命地往回跑。要返陕必须东渡黄河，政府通令，凡渡河、乘车（包括火车、汽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移民通行证”，便只能偷渡黄河。北洛村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农民趁夜色偷跑出农庄，当晚来到黄河边。时值隆冬，河面上结了层冰，青年农民义无返顾地蹬着破自行车上了冰面，突然，“咔嚓”一声可怕的巨响，浮冰塌陷下去，黑窟窿转瞬间将他吞没。几天后，一个妇女抱着婴儿胳膊上挎着包袱踏上了光洁如镜的冰面，走到河中央，脚下的冰层发现咔咔嚓嚓的断裂声，妇女惨叫一声，婴儿还来不及啼哭，母子俩跌落进冰窟窿里，几秒钟内，阴鸷的黄河水完成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水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